

# 中非粮食安全共同体的 应然逻辑与实践路径\*

安春英

**内容提要**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之变与世纪疫情相互叠加的复杂国际格局背景下，中非粮食安全共同体不仅是构建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内容之一，更是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场域。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对非粮食安全合作理念、原则及具体方式不断得到调适与完善，逐步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合作特点：在合作理念方面，秉持“真实亲诚”理念和正确义利观；在合作机制方面，注重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相结合；在合作重心方面，突出分享粮食生产技术；在合作维度方面，融通国际对非三边或多边合作；在合作目标方面，助力非洲提升粮食安全自我保障能力。当前，在新冠肺炎疫情、俄乌冲突延宕的冲击下，非洲粮食安全问题的长期性和脆弱性愈加突出，对中国在此领域的合作需求更为迫切。鉴此，精准对接非洲区域、国别层面的农业与粮食安全发展战略，加强对非粮食全产业链薄弱环节合作力度，以中非减贫合作强化非洲粮食安全体系韧性，进一步推进非洲粮食安全中“南南”“南北”双向度合作，可为深化中非粮食安全合作赋能。

**关键词** 非洲粮食安全 中非粮食安全共同体 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者简介** 安春英，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中国非洲研究院《西亚非洲》常务副主编、编审（北京 100101）。

从习近平主席 2013 年 3 月首次提出中非命运共同体重要思想，到 2018 年 9 月提出共筑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再到 2021 年 11 月在中非合作论坛第八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 2021 年度重大招标项目《非洲通史》(多卷本)(项目编号:LSYZD21022)的阶段性成果。

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发表题为《同舟共济，继往开来，携手构建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内涵不断丰富。环顾当今世界，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之变与世纪疫情相互叠加的复杂国际格局，2022年2月爆发的俄乌冲突使全球陷入新一轮粮食危机中。非洲作为发展中国家最为集中的大陆，正在经历气候变化、粮食安全等非传统安全形势严峻困境，而且这些挑战与风险已超出非洲国家独自应对的能力。那么，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如何回应日益突出的非洲粮食安全挑战？中非合作如何走深、走实、走远？

国内外学者关于非洲粮食安全治理已有一系列研究成果。国外学者对非洲粮食安全治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视角：一是从“水—能源—粮食纽带”关系<sup>①</sup>、人口增长<sup>②</sup>、气候变化<sup>③</sup>、粮食生产及其价值链<sup>④</sup>，以及新冠肺炎疫情、俄乌冲突对非洲粮食体系的冲击<sup>⑤</sup>等方面研判影响非洲粮食安全的因素；二是从非洲国家政策取向<sup>⑥</sup>、技术赋能<sup>⑦</sup>、农业产业多样化<sup>⑧</sup>、农业政治经济学<sup>⑨</sup>等方面，提出非洲粮食安全的治理路径；三是论及国际社会参与非洲粮食安全治理的影响与成效，<sup>⑩</sup> 其

- ① Barakat Mahmoud (ed.), *Food Security in Africa*, London: IntechOpen, 2021; FAO, *The State of Food and Agriculture 2020: Overcoming Water Challenges in Agriculture*, Rome, 2020.
- ② C. Hall et al., “The Impact of Population Growth and Climate Change on Food Security in Africa: Looking ahead to 2050,”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Sustainability*, Vol. 15, No. 2, 2017, pp. 124 – 135.
- ③ Merertu Berhanu and Alemayehu Oljira Wolde, “Review on Climate Change Impacts and its Adaptation Strategies on Food Security in Sub – Saharan Africa,” *AGRISE*, Vol. 19, No. 3, 2019, pp. 145 – 154.
- ④ Evans S. Osabuohien (ed.), *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Agricultural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Africa*, Houndmills: Palgrave Macmillan Cham, 2020.
- ⑤ Edward Mukiibi, “COVID – 19 and the State of Food Security in Africa,” *Agriculture and Human Values*, Vol. 37, No. 3, 2020, pp. 627 – 628; Helena Shilomboleni, “COVID – 19 and Food Security in Africa: Building More Resilient Food Systems,” *AAS Open Research*, Vol. 3, 2020, pp. 27 – 45.
- ⑥ John Dixon et al. (eds.), *Farming Systems and Food Security in Africa: Priorities for Science and Policy under Global Change*, London: Routledge, 2019.
- ⑦ Sabinet, “Technology Can Enhance Food Security in Africa,” *FarmBiz*, Vol. 5, No. 12, 2019, pp. 12 – 27.
- ⑧ Waha Katharina et al., “Agricultural Diversification as an Important Strategy for Achieving Food Security in Africa,” *Global Change Biology*, Vol. 24, No. 8, 2018, pp. 3390 – 3400.
- ⑨ Lotsmart N. Fonjong and Adwoa Y. Gyapong, “Plantations, Women, and Food Security in Africa: Interrogating the Investment Pathway towards Zero Hunger in Cameroon and Ghana,” *World Development*, Vol. 138, 2021, pp. 105 – 132.
- ⑩ Martin R. Rupiya, “The Implications for Food Security in Africa: Food Aid,” *African Security Review*, Vol. 13, No. 1, 2004, pp. 83 – 89.

中包括中国在中非粮食安全合作中的角色及其作用等相关内容。<sup>①</sup>国内学者则基于深化中非合作的现实需要,结合时代话题与学术前沿问题,在中非粮食安全合作研究中力求洞见,其研究主要涉及两个维度:一是将中非粮食安全合作置于中非农业合作视域中进行考察;<sup>②</sup>二是探究中非粮食安全合作之内在机理。<sup>③</sup>上述研究评析了中非粮食安全合作的历史、现状、发展趋势,但中非粮食安全合作宜超越中非合作领域之视野,从构建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之重要方位来解读。事实上,国内学界对于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研究或基于宏观层面,<sup>④</sup>或聚焦部分微观层面,如中非卫生健康共同体和中非气候治理共同体等,<sup>⑤</sup>仍有很大拓展空间。故本文将粮食安全合作内嵌于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之中,即中非粮食安全共同体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内涵是指中方秉持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意识、“真实亲诚”的价值理念,弘扬团结互助、患难与共、共同发展之精神,与非方在粮食安全领域开展双多边国际合作,努力提升非洲国家在粮食供应、获得、利用等方面的保障能力与水平。基于此,本文尝试解析中非粮食安全共同体的内在逻辑,总结中非粮食安全合作的特点,并提出构建中非粮食安全共同体之路径。

## 中非粮食安全共同体的生成逻辑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多层次、全方位的共同体,涵盖政治共同体、经济共同体、安全共同体、文化共同体、生态共同体等领域,其中安全共同体又可细分为

- 
- ① Niall Duggan and Teemu Naarajärvi, “China in Global Food Security Governanc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24, No. 95, 2015, pp. 943 – 960; FAO, “Voices from the Field: Personal Stories from the FAO – China South – South Cooperation Project in the Republic of Uganda,” <http://www.fao.org/3/cb2496en/cb2496en.pdf> [2022 – 03 – 09].
  - ② 叶前林、翟亚超、何维达:《中非农业合作的历史发展特征、经验及挑战》,《国际贸易》2019年第10期,第11—18页;唐丽霞、赵文杰、李小云:《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中非农业合作的新发展与新挑战》,《西亚非洲》2020年第5期,第3—20页。
  - ③ 胡必亮、马悦:《非洲粮食安全与中非农业合作商机研究》,《中州学刊》2017年第9期,第47—53页;安春英:《“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非粮食安全合作:战略对接与路径选择》,《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17年第2期,第93—105页;张帅:《中国对非粮食安全合作:理念、模式与前景》,《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1年第6期,第158—166页。
  - ④ 吴传华:《中非命运共同体:历史地位、典范作用与世界意义》,《西亚非洲》2020年第2期,第12—21页;余涛、张宏明:《全球治理背景下的中非命运共同体研究》,《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第38—45页。
  - ⑤ 曾爱平:《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合作:以中非共建“健康丝路”为视角》,《西亚非洲》2021年第1期,第26—47页;于宏源、汪万发:《气候地缘竞合背景下的非洲议题与中非合作》,《西亚非洲》2022年第1期,第93—110页。

能源安全共同体、产业安全共同体、粮食安全共同体、卫生健康共同体等多个方面。那么在中非合作中，中非粮食安全共同体何以形成？

### （一）粮食安全问题是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基础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源，粮以安为先。”这句话彰显了粮食在人类生存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对个体而言，粮食不仅是人们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必需品，而且是人们从事其他一切活动的前提和基础，更是保障公民生存权利的要件。对国家而言，粮食是一种特殊商品、战略物资，不仅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还关乎国家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正是基于经济特性、政治特性、战略特性等多重属性，粮食安全在一国非传统安全，尤其在人的安全和国家安全的构成中具有特殊意义，为全球安全治理场域所关注。

从全球视野看，20世纪70年代，世界性干旱引发的粮食危机，尤其是非洲的饥荒使国际社会更加关注粮食安全问题。联合国粮农组织在1974年11月第一次世界粮食首脑会议上，把粮食安全定义为确保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得到维持生存所必需的足够食物。<sup>①</sup>此后，联合国粮农组织相关研究专家根据各自研究目的和研究重点，不断丰富拓展粮食安全内涵，但无论哪种解释，其本质均在于既要确保粮食供应充足，又要确保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有能力得到足够的粮食。由此，粮食安全不仅指数量安全，还包括质量安全。一般而言，粮食安全包括粮食可供性、粮食的经济和物质可获性、粮食利用率、粮食市场稳定性等多个维度，其中粮食来源是否充足会影响可供消费粮食的数量和质量。倘若粮食供应短缺，其直接后果就是饥饿和营养不足，这是导致一国粮食不安全的首要致因。因此，要消除饥饿和营养不足，最直接的途径就是保障有效的粮食来源（即粮食生产）。当然，对于粮食消费者而言，粮食供应的稳健性、获取渠道的可达性以及获取的经济可负担性，也是保障其在任何时候都能通过有效途径获取足够粮食的核心因素。由此，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增进民生福祉，世界各国高度关注粮食供求关系的动态变化。

从历史角度看，粮食安全问题与民众的痛苦指数（失业率与通胀率之和）息息相关，而且在非洲引发了诸多社会不稳定事件。据日本学者石弘之统计，在非洲国家独立后的30多年时间里，曾发生过70多起政变，其中约1/3不同程度地与粮食匮乏和价格暴涨有关，如1981年塞拉利昂粮食暴动是由大米市场供应

<sup>①</sup> FAO, *Report of the World Food Conference*, Rome, 1974. 转引自公茂刚著：《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问题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13年版，第3页。

不足和价格上涨导致的。<sup>①</sup>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叠加粮食危机，使当年国际小麦和玉米市场价格较 2005 年分别增长了 85.3% 和 118.2%，<sup>②</sup> 苏丹、马里、刚果（金）等非洲国家因粮价上涨出现社会动荡。2018 年底，苏丹东北部城市阿特巴拉的面包价格上涨了 3 倍，点燃了苏丹街头政治的导火索，导致统治 30 年之久的奥马尔·巴希尔政权被推翻。可见，非洲和平与发展离不开粮食安全体系的构筑，粮食安全是非洲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而且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的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思想高度契合。

## （二）构建中非粮食安全共同体是对非洲安全威胁的现实回应

在全球化时代，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就意味着世界各国既要共享发展成果，也要共担危机与风险。当前，非洲大陆面临诸多安全风险，其中粮食安全问题尤为突出。

一方面，宏观层面的粮食供给不足。以 2020 年为例，从粮食供求关系看，非洲地区三大主粮（小麦、大米和玉米）产不足需缺口达到 8385 万吨，占当年主粮总消费量的 36.1%，这表明非洲国家粮食自我保障能力较弱，粮食安全水平较低。从人均粮食占有量看，由于非洲地区人口增速较快且粮食生产水平低，人均粮食消费量不到 200 公斤，远低于人均 400 公斤的国际粮食安全标准线，说明非洲地区膳食水平偏低，粮食不安全风险偏高。<sup>③</sup> 因此，非洲国家不得不从国际市场上采购粮食，粮食消费外贸依存度高，国际市场粮价波动及供给量变化均会波及非洲。例如，2022 年 2 月以来，俄乌冲突对全球粮食供给造成严重冲击，其中非洲国家承受的冲击波最为突出。俄罗斯和乌克兰作为全球小麦的主要出口国，也是非洲小麦进口的重要来源地。2018—2020 年，非洲从俄罗斯进口小麦金额达 37 亿美元，占其小麦进口总额的 32%；从乌克兰进口小麦金额为 14 亿美元，占其小麦进口总额的 12%；共有 30 个非洲国家从俄罗斯和乌克兰进口小麦，其中索马里、贝宁、埃及等 16 个国家从两国进口小麦占它们小麦进口总额的 50% 以上。<sup>④</sup> 不仅如此，俄乌冲突还严重扰乱了全球小麦供应链，一些国家出台了小麦出口管制干预措施，涵盖全球小麦贸易的 21%，致使小麦价格在 2022

① [日] 石弘之：《地球环境报告——〈朝日新闻〉高级记者关于地球环境的见闻录》，张坤民、王伟译，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39 页。

② Samah Sayed Ahmed, “The Impact of Food and Global Economic Crises (2008) on Food Security in Egypt,” *African and Asian Studies*, Vol. 13, No. 1 - 2, 2014, p. 223 - 224.

③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Foreign Agricultural Service, <https://apps.fas.usda.gov/psdonline/app/index.html#/app/home> [2022 - 03 - 16].

④ UNCTAD, “Tapering in a Time of Conflict,” March 2022, [https://unctad.org/system/files/official-document/trd2021-update1\\_en.pdf](https://unctad.org/system/files/official-document/trd2021-update1_en.pdf) [2022 - 04 - 04].

年1—3月上涨了40%。<sup>①</sup> 粮食供应减少和价格飙升，使许多非洲国家民众面临更为严重的粮食不足问题。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加纳代表安吉拉·卢西吉所言：“由于非洲贫困人口大部分消费支出用于购买食品，俄乌冲突导致的粮价飙升严重冲击了非洲粮食安全。”<sup>②</sup>

另一方面，微观层面的粮食获取能力缺乏。对于个体而言，粮食的可得性与其收入水平、粮食流通等情况密切相关。在非洲，贫困人口基数大，而且贫困发生率，是民众粮食短缺互为表里的集中体现。非洲约有一半人口处于每天收入不足1.9美元的极端贫困状态，收入少直接决定贫困群体的购买力低。加之，贫困人口应对暴力冲突、气候灾害、公共卫生灾害等风险能力低，更加剧了粮食不安全状况。例如，马达加斯加南部有114万人长期面临粮食不足困境，而由于2020年10月至2021年4月该地区遭受严重干旱，又新增2.8万缺粮人口。<sup>③</sup> 此外，粮食供应链的畅达可确保粮食生产和市场交易（包括国内和国外）顺利进行，其中运输网络的连通性与民众粮食获取能力息息相关。据统计，非洲地区有近一半国家（48.7%）的粮食运输网络韧性水平低，一旦发生粮食运输道路受阻情况，刚果（金）、马达加斯加、尼日尔、塞内加尔、苏丹等国货物运输时间会延长30%以上。<sup>④</sup> 基础设施薄弱等因素会推高粮食交易成本，进而影响民众的粮食可获得能力。

总体来看，非洲地区在全球粮食安全体系中处于薄弱点，2021年世界上粮食不足人口中有1/3生活在该地区，全球44个缺粮国家中非洲占33个。<sup>⑤</sup> 值得注意的是，非洲粮食不安全状况具有长期性和脆弱性，该地区粮食不足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一直徘徊在20%左右。由此，着力改善非洲粮食安全状况，既需要非洲国家自身努力，也成为南南合作的重要切入点。

### （三）构建中非粮食安全共同体是践行中非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担当

随着中国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参与全球安全治理的角色也发生

- 
- ① World Bank, *Africa's Pulse: An Analysis of Issues Shaping Africa's Economic Future*, Washington D. C., 2022, p. 28.
  - ② Angela Lusigi, "Africa and the Russia - Ukraine Conflict: Seizing the Opportunity in the Crisis," *Africa Renewal*, June 30, 2022, <https://www.un.org/africarenewal/magazine/africa-and-russia-ukraine-conflict-seizing-opportunity-crisis> [2022-07-04].
  - ③ "Food Insecurity," *Africa Research Bulletin: Economic Financial and Technical Series*, Vol. 58, No. 6, 2021, p. 23511.
  - ④ 联合国粮农组织:《2021年粮食及农业状况:提高农业粮食体系韧性,应对冲击和压力》(中文版), <https://doi.org/10.4060/cb4476zh> [2022-05-06].
  - ⑤ FAO, "Crop Prospects and Food Situation," March 2022, <https://www.fao.org/3/cb8893en/cb8893en.pdf> [2022-05-20].

变化，由参与者、融入者逐渐向积极贡献者和责任担当者转变。在 2018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中非领导人一致同意携手共筑责任共担、合作共赢、幸福共享、文化共兴、安全共筑、和谐共生的中非命运共同体，这一战略共识成为中非双方共同努力的方向与奋斗目标，被写入《新时代的中非合作》白皮书。其中的“责任共担”和“安全共筑”，意指中国愿意与非洲国家一道，共担安全治理责任，共筑安全治理体系，共同塑造非洲和平与发展的未来。具体到粮食安全领域，习近平主席在 2015 年、2018 年和 2021 年三届中非合作论坛开幕式上发表的主旨演讲中，均高度关注非洲粮食安全问题，从“中非农业现代化合作计划”到“产业促进行动”，再到“减贫惠农工程”，都把帮助非洲解决粮食安全问题作为中非农业合作的要义。这表明中国针对非洲国家粮食安全的严峻形势，肩负起了安危与共、同舟共济的大国担当，高度契合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近年来国际多边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遭到挑战，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盛行，中国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全球治理合作。2021 年 9 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将粮食安全列为全球发展治理的八大领域之一。2022 年 1 月，习近平主席在 2022 年世界经济论坛视频会议上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促进发展、保障民生置于全球宏观政策的突出位置，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促进现有发展合作机制协同增效，促进全球均衡发展。”<sup>①</sup>这段话体现出中国致力于提升粮食安全等全球性治理问题的合作力度、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和主动担责之决心。

新时代，中国有意愿也有能力在非洲粮食安全领域更多地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中国以“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为指导，依靠自身力量实现了粮食基本自给。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 年中国粮食总产量达 6.695 亿吨，人均占有量为 474 公斤，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谷物产量占粮食总产量的 92.1%，谷物自给率超过 95%，口粮绝对安全。<sup>②</sup>在粮食储备能力建设方面，通过储粮新技术广泛应用，中国从中央到地方已建立起一批现代化粮仓，仓容规模逐年增加，粮食库存消费比（约为 35%）远高于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17%~18%），成为维护中国粮食安全的“压舱石”。与此同时，无论是原粮、散粮运输，还是成品粮集装箱化运输，公路、铁路、水路等畅达的联运系统

① 习近平：《共创后疫情时代美好世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外文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486 页。

② 《国家统计局农村司司长李锁强解读粮食生产情况》，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2020 年 12 月 10 日，[http://www.stats.gov.cn/xxgk/jd/sjjd2020/202012/t20201211\\_1808749.html](http://www.stats.gov.cn/xxgk/jd/sjjd2020/202012/t20201211_1808749.html) [2022 - 02 - 18]。

确保了粮物流的高效。加之，中国已建立了 10 ~ 15 天的应急成品粮储备，使之能在应对雨雪、旱涝自然灾害和国际粮价大幅波动时发挥关键作用。此外，随着中国在 2020 年取得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基本解决了“不愁吃”问题，2021 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18931 元。<sup>①</sup>可以说，中国在提升粮食生产能力、发展粮食产业经济、完善粮食市场体系、参与世界粮食安全治理等方面，走出了一条具有本国特色的粮食安全之路。在中国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提升的背景下，与非洲国家分享确保粮食安全的经验，助力非洲国家最终实现粮食安全，彰显了中国积极参与非洲粮食安全治理贡献者角色。

## 中非粮食安全合作的特点

中非粮食安全合作最初属于中国对非援助范畴。从 1959 年至今，中非粮食安全合作已历经 60 余年发展历程，双方合作逐渐走向深入，突出表现为以下几方面特点。

### （一）合作理念：秉持“真实亲诚”和正确义利观

中非粮食安全合作系中非全方位合作的一部分，是新时代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有机构成，因此中方在该领域合作同样秉持“真实亲诚”理念和正确义利观。与西方国家只热衷于为非洲国家制定发展蓝图和计划不同，中国在对非各领域合作中，始终尊重非洲国家的发展需要和意愿，强调中非之间团结互助与共同发展。2015 年 12 月，中国政府发表第二份《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强调，中国尊重非洲国家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尊重非洲国家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改善人民生活的实践和努力，愿在平等自愿基础上同非洲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促进双方对彼此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的了解、认同和借鉴。<sup>②</sup> 2021 年 11 月，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新时代的中非合作》白皮书，重申中方在对非合作中坚持相互尊重、共同发展，始终践行“四个坚持”和“五不”原则，形成了一条特色鲜明的中非合作共赢之路。<sup>③</sup> 这些表述均体现了中非携手共命运、同

① 《方晓丹：居民收入继续稳步增长 居民消费支出持续恢复》，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2022 年 1 月 18 日，[http://www.stats.gov.cn/tjsj/sjjd/202201/t20220118\\_1826529.html](http://www.stats.gov.cn/tjsj/sjjd/202201/t20220118_1826529.html) [2022 - 02 - 18]。

② 《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2015 年 12 月），《人民日报》2015 年 12 月 5 日，第 4 版。

③ “四个坚持”，即坚持真诚友好、平等相待；坚持义利相兼，以义为先；坚持发展为民、务实高效；坚持开放包容、兼收并蓄。“五不”原则，即不干预非洲国家探索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不干涉非洲内政，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不在对非援助中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不在对非投资融资中谋取政治私利。

心促发展之价值观。

基于此，中方在粮食安全合作中充分尊重非方发展议程和自主选择。《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2001 年 7 月）、《非洲农业综合发展计划》（2003 年 7 月）、非盟《2063 年议程》（2015 年 4 月）等文件，明确提出了非洲实现粮食自给的宏伟愿景。目前，非洲各国都在加紧落实规划，全力提升农业产业化、现代化水平，增强粮食安全保障能力。鉴此，在中非粮食安全合作中，中方强调支持非洲国家实施《非洲农业综合发展计划》，包括非盟主导的食品安全项目与活动。<sup>①</sup>此外，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负责任的大国，在国际舞台上为非洲仗义执言，维护非洲国家的主权、发展和安全利益，这亦是中國积极践行“真实亲诚”理念和正确义利观的具体体现。在 2017 年 2 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 34 次会议上，中国代表 140 个国家发表题为《促进和保护人权，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推动会议通过关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和“粮食权”两个决议，明确表示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sup>②</sup>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首次载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决议，其中“粮食权”被置于构建人类共同体的语境中，拓宽了全球人权治理路径，有利于推进国际社会“粮食权”与非洲议题的结合。

## （二）合作机制：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相结合

粮食安全议题不仅仅属于经济问题，而是兼具经济特性、政治特性、战略特性等多重属性。因此，中国政府从 20 世纪 50 年代末开始就将粮食安全作为对非援助的重要领域，并通过商务部、农业与农村部、外交部、财政部、教育部、卫健委等行政机构，落实中国对非粮食援助、合作及其关联项目。其中，2018 年之前援助事项由商务部归口管理，并通过其下属机构来具体执行，如国际经济合作事务局负责对外援助成套项目管理、监督与实施；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负责一般援助物资招投标、实施与管理，以及南南合作援助基金项目等；国际商务官员研修学院负责全国援外培训协调管理、援助培训项目执行落实。农业农村部协同商务部展开农业援助与合作，如派遣农业专家、管理中非农业技术示范中心等。2018 年 4 月，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成立，整合和优化了中国对外援助管理体系，加强了对外援助的管理与协调。外交部在 2000 年创立了中非合作

① 《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宣言》，中非合作论坛官方网站，2015 年 12 月 25 日，[http://www.focac.org/chn/zywx/zywj/201512/t20151224\\_7875847.htm](http://www.focac.org/chn/zywx/zywj/201512/t20151224_7875847.htm) [2022-03-05]。

②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大理念首次载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决议》，中国人权网，2017 年 3 月 24 日，<http://www.humanrights.cn/html/rqbb/video/gj/2017/0324/1973.html> [2022-03-06]。

论坛，每三年发布一次会议宣言、行动计划，对包括粮食安全在内的中非合作发展规划、落实路径具有纲领性意义，成为中非开展集体对话的重要平台和务实合作的有效机制。除了“一对多”中非合作论坛机制外，根据非洲发展需求以及中非农业领域的互补性，中国与非洲国家及地区组织还建立了一些农业合作机制，如中国—埃塞俄比亚杂交谷子联合研发中心、中国—非盟农业合作委员会等，<sup>①</sup> 并签订了一系列农业与粮食发展方面的合作协议。截至目前，中国与 23 个非洲国家及地区组织建立农业合作机制，签署双多边农业合作文件 72 项。2012 年以来，中国与 20 个非洲国家及地区组织签署农业合作文件 31 项。<sup>②</sup>

企业是中国对非经济活动的主体与依托。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中国实施援外方式改革后，中垦集团、江苏农垦、安徽农垦、湖北农垦等大型国有企业开始探索对非粮食领域投资合作。近年来，中国民营企业实力不断增强，逐渐成为中非农业合作的新生力量，如 2012 年中地海外集团在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创建了农业高科技产业示范园。此外，2010 年 3 月启动的“中非联合交流计划”，为中国智库参与中非治国理政交流注入新活力。毋庸置疑，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企业和智库，通过各自合作机制，已形成对非粮食安全合作的合力。

### （三）合作重心：分享粮食生产技术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非洲粮食产量的增加离不开农业研发与技术推广。在过去几十年中，中国对非粮食安全合作突出技术转移因素，努力提升非洲国家的粮食供应水平。

一方面，中国通过对非援建农业合作示范项目和投资农业产业园，分享中国粮食生产经验。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援建了乌干达奇奔巴农场、毛里塔尼亚姆颇利水稻农场、索马里费诺力农场等。<sup>③</sup> 根据中国政府与非洲受援国政府签订的协议，中方负责供应服务于农场建设的农机设备，建设水利灌溉配套设施，提供农场生产技术指导，参与农场的计划管理等事宜。援建农场呈现稳定发展态势后，就移交给受援国政府。21 世纪以来，中国援助非洲的农业技术示范项目也与时俱进，2011 年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与中国农业大学在坦桑尼亚开展中国农业技术的村级试验示范项目，中国农业大学项目团队在坦桑尼亚莫罗戈罗省佩雅佩雅村等 10 个村先后进行玉米良种选育、翻地、间苗、除草等精耕细作，使试

① 唐丽霞、赵文杰、李小云：《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中非农业合作的新发展与新挑战》，第 14 页。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时代的中非合作》（2021 年 11 月），人民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20 页。

③ 王成安：《中非农业合作：功在千秋 利在长远》，《人民日报》2000 年 9 月 12 日，第 7 版。

验田玉米产量平均增加2~3倍。<sup>①</sup>

另一方面，中方派遣农业技术专家，援建中非农业技术示范中心，传授农业实用技术。在20世纪60—90年代，中国曾派遣农业技术人员在塞拉利昂、尼日尔、马里等十几个非洲国家的技术实验站、推广站，通过研究、试验、推广和扩散等农业技术传播途径，进行粮食作物种植技术、繁育技术、管理技术以及农产品初加工技术等方面指导，将农业技术快速推广到非洲当地农户手中，进而转化为生产力。2007年10月至2009年底，中国又向摩洛哥、加纳等33个非洲国家派出104名高级农业专家。根据各国农业技术援助需求，中国派遣的高级农业专家专长有所不同，如中国政府派赴加纳的三位高级农业专家技术专长分别是农业灌溉工程、水稻种植生产及加工和淡水养殖，以此为受援国提供不同领域的技术服务。2015年，中方宣布派遣30批农业专家组赴非洲，主要针对种植业和养殖业遇到的实际问题提供务实性技术指导和培训。2018年，中方又向非洲派遣500名高级农业专家，主要是通过提供农业生产与管理技术培训，培养青年农业科研人才和农民致富带头人。<sup>②</sup>

中非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则是中国在非洲传播农业技术、进行可持续合作的工作站。自2007年中莫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启动建设以来，中国已在莫桑比克、赞比亚、苏丹等22个国家建成23个农业示范中心。<sup>③</sup>中方技术人员除进行现场技术示范操作以外，还面向当地农业官员、技术人员、农民等进行农技知识集中培训。袁氏国际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运营的中国马达加斯加农技示范中心，自2007年8月起在该国推广杂交水稻种植技术，使当地种植杂交水稻的农户平均稻谷单产达每公顷7.5吨，最高单产超过每公顷10吨。2020年4月，马达加斯加农业、畜牧业和渔业部部长拉那利维鲁在参观了距离首都塔那那利佛35公里的马义奇杂交水稻高产示范基地后表示：“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很多国家粮食进口面临困难的背景下，杂交水稻为马达加斯加粮食安全提供重要保障。”<sup>④</sup>

#### （四）合作维度：融通国际对非三边或多边合作

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零饥饿”是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重要目标之一，也是国际发展合作的重要内容。在某种程度上，中非粮食安全合作是全球

① 李小云等：《消除绝对贫困：中国的实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2020年9月，第67页。

②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八大行动”内容解读》，中国商务部网站，2018年9月19日，[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ae/ai/201809/2018090278842\\_1.shtml](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ae/ai/201809/2018090278842_1.shtml)[2022-03-13]。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时代的中非合作》（2021年11月），第20页。

④ 吕强：《为非洲缓解粮食问题作出贡献》，《人民日报》2020年4月27日，第16版。

粮食安全治理的一部分，双方合作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

在三方合作方面，中国探索与其他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在非洲实施粮食安全项目。2016年6月，中国商务部、莫桑比克农业与粮食安全部和美国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三方代表签署了《关于莫桑比克农业三方合作框架》。据此，在“莫方提出、莫方同意、莫方主导”的原则下，依托中莫农业技术示范中心，三方在科学研究、农业和畜牧业技术示范推广、能力建设等方面展开合作，以帮助莫方提高主粮生产率、改善营养状况和提高当地农民收入。对于中国在马里、加纳、马达加斯加等非洲国家开展的“绿色超级稻”国际农业科技扶贫项目，盖茨基金会也提供了资金支持。

在多边合作方面，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南南合作办公室对非粮食安全合作项目。中国通过联合国粮农组织“粮食安全特别计划”框架下的南南合作途径，成为促进南南合作及三方合作的主要伙伴之一。自2009年“联合国粮农组织—中国南南合作计划”启动以来，中国政府已向该计划提供两期捐资共计8000万美元，中国农业专家在乌干达、纳米比亚等14个亚非国家从事改善谷物生产、畜牧业、园艺、渔业和水产养殖、水土管理等方面工作，受益者达7万多人。其中，乌干达项目（第一期、第二期）是整个合作计划中为最长、最为成功的合作范例之一。<sup>①</sup> 2020年9月，习近平主席宣布再次为“联合国粮农组织—中国南南合作计划”捐资5000万美元，用于开展第三期工作。2022年1月，该计划第三期工作正式启动，主要涵盖提高农业生产、价值链和贸易、热作农业和旱作农业以及数字农业等领域，支持发展中国家实现农业粮食体系可持续转型，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特别是为消除贫困（SDG1）和“零饥饿”（SDG2）作出贡献。<sup>②</sup>

#### （五）合作目标：助力非洲提升粮食安全自我保障能力

当前，全球粮食安全的内涵正在从数量安全向质量安全、经济安全、资源环境安全等方面拓展。就非洲而言，确保数量安全是现阶段非洲国家长期性基本发展诉求。中国对非粮食安全合作的目标，并不仅仅是为了帮助非洲国家解决暂时粮食短缺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帮助非洲国家提升粮食安全能力建设。

中国在实施对非粮食合作项目过程中，除了以技术转移为核心，还综合施

① FAO, “Voices from the Field: Personal Stories from the FAO – China South – South Cooperation Project in the Republic of Uganda,” <http://www.fao.org/3/cb2496en/cb2496en.pdf> [2022-03-19].

② 《联合国粮农组织与中国政府签署重要协定，继续深化南南合作》，中国网，2022年1月13日，[http://guoqing.china.com.cn/2022-01/13/content\\_77987376.htm](http://guoqing.china.com.cn/2022-01/13/content_77987376.htm) [2022-03-25].

策,开展形式多样的培训活动,以期解决非洲宏观层面的粮食供应不足和微观层面的粮食获取能力缺乏问题。如果说派遣农技专家、援建中非农业技术示范中心是中国对非农业人力资源培训的“送上门”服务,那么在华举办各类涉农培训班则是“请进来”的重要表现。2012 年以来,在华培训非洲农业学员 7456 人次。<sup>①</sup>其中,商务部国际商务官员研修学院、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中国农业大学举办了多期援外农业培训班,有的是面向发展中国家,有的则是专门针对非洲国家。例如,2015 年商务部面向非洲举办了 70 多个援外农业培训班,包括种植业、畜牧业、水产养殖、农业机械、农业政策与管理等丰富内容,培训 1500 多人次。<sup>②</sup>通过经验分享以及实地考察等培训活动,增加了非洲学员对于农业发展与综合治理的感性和理性认识。

此外,中国政府每年还向一些非洲国家提供水稻、玉米和其他作物种子,新型多元复合肥、高效低毒农药,以及拖拉机、大型联合收割机、农机具和成套农产品加工设备等,助力它们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例如,2019 年 8 月,中国政府向埃塞俄比亚捐赠了 148 台套农业设备,用于该国农业技术试验示范和推广。<sup>③</sup>农业基础设施的优化会提升农业生产应对各类自然风险的能力,中国企业在非洲援建或承建了诸多水利基础设施,如埃塞俄比亚的特克泽水电站、苏丹的麦洛维大坝项目等。这些项目系集水利、发电、灌溉于一体的综合性水利工程,可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当地农业生产、生活用水或用电需求。

总之,无论是中国对非开展的农业技术培训,还是提供的农业物资援助,抑或实施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都有助于同非洲国家分享中国农业发展经验和农业技术,提升非洲国家的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水平。由此,以提高非洲国家自主发展能力为目标,是中国对非粮食安全合作的本质特征之一,也是与西方对非合作的重要区别所在。

综上,非洲是中国开展国际农业合作的重点地区。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对非粮食安全合作理念、原则及具体方式不断得到调适与完善,逐步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合作模式,为非洲改善农业基础设施,提高农业技术水平,增加粮食产量,缓解粮食短缺,消除极端贫困提供了中国智慧和方案。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时代的中非合作》(2021 年 11 月),第 20 页。

② 中国农业部对外经济合作中心秦路高级经济师在 2016 年 9 月 10 日中国亚非学会年会上的发言。

③ 《中国科技助力非洲实现“零饥饿”目标》,中国政府网,2019 年 10 月 15 日, [http://www.gov.cn/xinwen/2019-10/15/content\\_5440144.htm](http://www.gov.cn/xinwen/2019-10/15/content_5440144.htm)[2022-03-02]。

## 深化中非粮食安全合作的路径

在新冠肺炎疫情延宕至第三个年头、俄乌冲突仍在持续的当下，非洲粮食安全危机加剧。基于新时代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理念，需要结合中非在此领域合作中出现的问题或短板，从战略、策略、内容、形式和路径多元视角，进一步深化中非粮食安全合作。

### （一）全面提升中非粮食安全合作的战略重要性

俄乌冲突已逾数月，对全球经贸、金融、能源、粮食产业链和供应链造成巨大冲击，加剧了非洲粮食危机，进而影响非洲实现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俄乌冲突对非洲粮食安全的负面影响体现在四方面：从粮食贸易看，俄乌冲突导致非洲粮食供应链危机；从粮食生产看，俄乌冲突外溢效应波及非洲国家的粮食产能；从粮食购买力看，俄乌冲突引发的粮食价格上涨削弱了非洲民众的粮食可获得性；从粮食外援看，国际对非粮援趋紧。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大搞地缘政治博弈，奉行单边主义、集团政治与胁迫外交等，将经贸合作政治化，使全球粮食安全困境愈演愈烈，非洲粮食安全赤字风险日益高企。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世界和平与发展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上升，中非凝聚战略共识、携手共进、破解非洲粮食安全难题的需求更加迫切。尼日尔前外长明达乌杜直言，“俄乌冲突的一个后果是，非洲人对世界其他地区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日益认识到其传统国际合作伙伴为应对消除饥饿等安全威胁而划拨的资源与它们为支持乌克兰而调动的资源之间存在着差异。因此，非洲国家政府如今比以往更愿意与中国等新伙伴合作。”<sup>①</sup> 因此，化危为机、加大中非粮食安全合作力度，以回应非洲国家的新期待，可深化中非利益交融，激发中非民众共情之感，优化中非合作舆情环境，夯实中非关系民意基础。

### （二）精准对接非洲区域与国别层面的农业与粮食安全发展战略

毋庸置疑，全球层面的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以及非盟《2063 年议程》和《非洲农业综合发展计划》，均规划了非洲农业与粮食安全发展目标、重要领域、重点项目和实现路径，它们是中非共建粮食安全共同体的纲领性文件。这主要是基于非洲地区在农业领域基础设施薄弱、农业全要素生产率较低、

<sup>①</sup> 《尼日尔前外长：非洲比以往更愿意与中国合作》，参考消息网，2022 年 6 月 27 日，<http://column.cankaoxiaoxi.com/2022/0627/2483937.shtml> [2022 - 06 - 30]。

粮食安全体系脆弱等方面存在的共性问题。一方面,中方可继续利用中国—非盟农业合作委员会、中非绿色农业发展研究中心、中非合作论坛等机制,强化中非农业与粮食安全合作的顶层设计,搭建中非粮食安全合作的平台。另一方面,非洲有54个国家,各国在农业资源禀赋、农产品结构、农作物生产方式、农业投入力度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面临构建粮食安全体系的困境各不相同。中非在粮食安全合作时,不仅要关切全非洲宏观层面、次区域中观层面的战略对接,还要下沉到具体的国别微观层面,即识别不同非洲国家粮食发展“短板”因素及其战略发展具体领域,精准对接非洲各国的农业发展战略,制订国家间长期农业合作规划,以提升中非粮食安全的有效性。例如,西非国家利比里亚主要粮食作物是水稻和木薯,但该国粮食产量偏低,远远不能满足国内居民基本需求,每年有50%~60%大米从国外进口。该国粮食短缺的主要原因是:农民采用小农单独经营方式,未使用良种和肥料,灌溉设施不足,道路网络不完善导致农产品运输成本高,农产品市场流通渠道有限,等等。为此,该国出台了水稻发展国家战略,明确提出加强耕地资源管理、提高农业生产技术、发展低地灌溉项目等具体发展规划。鉴此,中国在与利比亚里合作中,如何有针对性地契合利方水稻发展战略,提出增加当地水稻产量的可行方案,是双方合作提质增效的关键。

### (三) 加强对非洲粮食全产业链薄弱环节合作力度

粮食产业链是指涉及粮食种植、收获、加工、储藏、运输、批发与零售、公共或家庭消费等生产链、加工链到商品链的全过程。构建非洲国家系统性粮食安全体系,不仅需要解决粮食供应链即上游生产环节问题,而且中下游环节能力建设亦不可忽视。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及俄乌冲突冲击之下,世界各国都在追求更高的经济安全性,关注产业链的完整性,进行产业链重新布局。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粮食生产技术水平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落后,现代化仓储设施严重缺乏,冷藏车等运输装备不足,以及道路畅达性水平低等原因,非洲国家在粮食生产、加工、储运和消费过程中损耗现象较为严重,每年粮食损耗量大体相当于4800万人一年的粮食需求。其中,粮食生产和储存环节是关键浪费点,粮食损耗率分别为64%和59%。<sup>①</sup>在俄乌冲突发生后,不少非洲国家迅速采取提升粮食产能的举措并加快现代化粮仓建设,如埃及开始实施扩大小麦储存筒仓计划,拟依靠新技术储存小麦并减少浪费,提高粮食的储备能力。鉴此,中国在对非粮食合作中,除了继续进行技术转移,开展杂交水稻、智慧农业等技术合作外,还

<sup>①</sup> FAO, *The State of Food and Agriculture 2019: Moving forward on Food Loss and Waste Reduction*, Rome, 2019, p. 26.

可以把减少粮食损耗作为一个着力点，如援建粮食仓储和基本加工设施等，帮助非洲国家提升粮食供给保障能力。另外，在非投资企业可利用已建成的经贸合作园区尤其是农业产业园，根据投资伙伴国农情，开展农产品种植、加工、仓储、销售等环节全产业链经营业务，提高非洲农产品本地化加工能力和农产品附加值，从而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 （四）以中非减贫合作强化非洲粮食安全体系韧性

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相似，非洲国家绝大多数贫困人口生活在农村地区，粮食短缺是贫困的首要 and 突出表现，农民是提升非洲国家整体粮食获取能力的关键群体。减缓贫困需要通过改善公路、铁路、机场、港口、通信、水电设施等经济基础设施条件，提供就业岗位，加大对农民的知识技能培训，提升农村贫困人口自我发展和自我减贫能力，这与个体微观层面的粮食获取能力相契合，也与增强粮食安全体系韧性息息相关。相关研究表明，每一个百分点的农业增长率将使极端贫困人口贫困发生率下降 2.9 个百分点、贫困家庭消费支出能力增加 3 倍。<sup>①</sup>可以说，对于非洲国家而言，农业及其相关产业发展对于促进经济增长、减贫以及保障粮食安全，均发挥着关键性作用。

正是基于中非减贫合作和粮食安全合作的内在关联性，中国在与非洲国家开展减贫合作、落实中国对非减贫与援助项目时，可助力中非粮食合作，形成协同效应。粮食产业属于弱质产业，投资大，收效慢，易受多种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影响，其中资金短缺是制约农业企业对非投资的重要原因。中国对非各类援助性质的资金，可适当向在非洲的中资企业建设涉农基础设施及仓储、加工、物流等项目倾斜，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中非减贫合作与农业投资开发合作项目结合不够紧密问题，有助于提升非洲粮食产出水平和附加值，也有助于增强当地粮食安全保障网建设。

#### （五）进一步推进非洲粮食安全“南南”“南北”双向度合作

富有韧性的粮食安全体系涵盖从生产到流通各个环节，关联领域多，往往需要较大规模且持续性的资金投入，以及高技术支撑。虽然非洲大陆在 1996—2015 年间保持了 4%~6% 的经济增速，但多数国家政府财政支出仍处于财政赤字或紧张性平衡态势，对农业领域的投资仅占年度财政预算的 2%~3%，远未

<sup>①</sup> UNDP, *Africa Human Development 2012: Towards a Food Secure Future*, New York, 2012, p. 67.

达到《非洲农业综合发展计划》提出的农业资金投入占 10% 的水平。<sup>①</sup> 而农业生产需要大量资本投入，土地、劳动力、肥料、灌溉、技术等投入状况会决定农业生产率。仅就农业系统用水形式来看，撒哈拉以南非洲仅有 3% 的农业属于灌溉农业，其余均属于低投入的雨养农业。<sup>②</sup> 当下，非洲落后的资源开发利用状况，极大推高了国际合作伙伴对非农业援助或投资成本，增加了合作难度。虽然中方在以往的中非粮食安全项目中注重提供技术转移，通过援助和投资方式实现了涉农领域一定的资金流入，但仍无法满足非方的迫切需求，面临的资金投入压力很大。

无论是新冠肺炎疫情还是俄乌冲突，均助推粮食安全成为全球安全治理、发展治理的核心议程之一。中非粮食安全合作的基本属性是南南合作，也是国际对非粮食安全治理的一部分。基于中非合作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特点，中非在粮食安全领域可积极尝试三方合作、多边合作。具体而言，中方可与发达国家（包括私营公司）、其他发展中国家各施所长，汇聚整合资金技术、现代农业管理等优质资源，助力非洲粮食安全体系建设。在援助领域，中方可利用粮农组织“南南合作及三方合作”平台，根据非洲国家的发展需求，协调日本的“非洲水稻发展联盟”项目、美国的“未来粮食保障”项目、英国的“食品安全和营养新联盟”项目、巴西的“学校供膳”项目、越南的“水产养殖和稻米生产”项目等，在项目实施的具体国家进行三方合作，发挥个体差异化优势，从而产生倍增效应。在投资领域，中国可利用与法国、日本、意大利等近 20 个国家建立的第三方市场合作机制，挖掘双方在非洲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现代化粮仓、储运等方面的投资合作商机，增进利益交汇，为非洲粮食安全治理增加新动能。

## 余 论

21 世纪以来，中国快速发展显著提升了自身国际地位与世界影响力，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角色亦由参与者、跟随者向倡议者、推动者和贡献者转变。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把发展中国家最为集中的非洲作为履行大国责任的重点区域，中非粮食安全共同体建设彰显中国不断增强的国际责任担当，将有效推进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进程。

① 唐丽霞、赵文杰、李小云：《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中非农业合作的新发展与新挑战》，第 17 页。

② FAO, *The State of Food and Agriculture 2020: Overcoming Water Challenges in Agriculture*, Rome, 2020, p. 38.

2021年11月，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发布了中非双方首次共同制订的中长期务实合作规划《中非合作2035年愿景》，确定了未来15年中非合作的总体框架，其中包括中方积极参与《非洲农业综合发展计划》、农业合作向全产业链延伸、增强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等内容。<sup>①</sup>这表明粮食安全仍然是未来中非合作的重要着力点。当前，非洲传统农业正在借力第四次工业革命新技术加快向现代农业转型，以期实现跨越式发展。值得注意的是，非洲正在探索将人工智能、信息化、数字化技术用于农业发展，非盟于2020年发布了《非洲数字化转型战略（2020—2030）》，南非、尼日利亚、肯尼亚、摩洛哥等国开启了打造智慧农业的实践。例如，2013年加纳“农户在线”（Farmerline）数据平台上线，为小农户、农企、贸易商提供农产品信息数据，服务用户涵盖非洲25个国家的100多万农户。2014年位于开普敦的人工智能公司——南非农业技术公司（Aerobotics）创立，它利用无人机和卫星航拍图像为用户提供农作物早期问题检测服务，以减轻病虫害对农作物的损害。2018年摩洛哥“农业之缘”（AgriEdge）公司创立，使用无人机、卫星航拍图像以及气象数据等智能科技对农作物进行精细管理，5个非洲国家的3万多农户受益。<sup>②</sup>鉴此，中方在粮食安全领域履行大国国际责任过程中，一方面需要做精做强中非粮食安全已有合作模式，继续在国际舞台上为维护非洲国家的粮食权和粮食安全发声，打造包容性粮食治理多边平台；另一方面，注重双方合作中粮食产运储销等各个环节的数字化技术运用，推动双方合作不断创新与深化。

（责任编辑：李若杨 责任校对：凌荷）

① 《中非合作2035年愿景》，中国商务部网站，2021年12月8日，<http://xyf.mofcom.gov.cn/article/lt/202112/20211203226116.shtml> [2022-02-11]。

② AUC and OECD, *Africa's Development Dynamics 2021: Digital Transformation for Quality Jobs*, AUC, Addis Ababa/OECD Publishing, Paris, 2021, p. 27.

## The Role of the FOCAC in Setting the Global Development Agenda and Its Path to Improvement

Wang Xinying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latform and effective mechanism for collective dialogue and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n countries, the Forum on China – Africa Cooperation (FOCAC) has set a model for South – South cooperation and led the new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with Africa. According to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the international agenda – setting theory, the FOCAC plays multiple roles in setting the global development agenda, including issue initiators, issue alliances and cooperation network builders, issue disseminators, and institutional and policy converters. By setting and proposing development issues, relying on extensive interest mobilization to build development issues alliances and cooperation networks, using appropriate “access routes” and “access points” to incorporate development issues into the global development agenda and realize the institutional and policy transformation of development issues, the FOCAC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setting the global development agenda. In the future, the FOCAC can be promoted to play a larger role in the setting of the global development agenda by optimizing the set of development issues, establishing a wider cooperation network on development issues, and building a new type of global development partnership to make greater contributions to the achievement of glob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Keywords:** The Forum on China – Africa Cooperation (FOCAC), international agenda – setting, global development agenda, global development Initiative

**Author:** Wang Xinying, Professor at School of Marxism,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alian 116024).

## The Ideal Logic and Practical Approach of the China – Africa Community of Food Security

An Chunying

**Abstract:** The world is undergoing major changes and a pandemic unseen in a

century. In this complex international landscape, the China – Africa community of food security not only becomes an important part of building the China – Afric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in the new era, but also becomes an important arena for building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For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China has continuously adjusted and improved the philosophy, principle and concrete ways of China – Africa food security cooperation, and has formed its unique cooperation features. For cooperation philosophy, China adopts the principle of sincerity, real results, amity and good faith and the principle of pursuing the greater good and shared interests; for cooperation mechanism, China combines government guidance with social participation; for cooperation priority, China gives prominence to sharing food production technologies; for cooperation dimension, China integrates international triangular cooperation or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with Africa; for cooperation objective, China aims to help Africa improve its own food security capacity. Under the impact of the COVID – 19 pandemic and Russia – Ukraine Conflict, as the long – term nature and vulnerability of its food security becomes more prominent, there is a strong demand for Africa to cooperate with China in this area. Therefore, in order to empower China – Africa food security cooperation, China should precisely align with African regional and national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food security strategies, strengthen its cooperation with Africa’s weak links in the whole food security chain, enhance the flexibility of African food security system through China – Africa poverty reduction cooperation, and promote “South – South” and “South – North” cooperation to achieve African food security.

**Keywords:** African food security, China – Africa Community of Food Security, China – Afric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in the new era,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uthor:** An Chunying, Senior Editor at Institute of West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nd China – Africa Institute ( Beijing 100101 ).